

# 论“报章体”的体性和流变

丁晓原

**内容提要** “报章体”散文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存在。报刊与论说是这一文体的要素。“报章体”因得梁启超等的亲炙而大放异彩，但并不只是晚清一时所成。从王韬《循环日报》至梁启超《清议报》到陈独秀《新青年》，“报章体”历经从发生到大盛而转型的历史过程。作者主体身份的自觉和媒体之便，文本中欧西因素的导入等，使“报章体”散文别开新境，意含卓异，成为特殊的时代文体。

“报章体”是中国散文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之间的重要链接件。基于新载体新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必然使“报章体”散文在写作的主体、本体和受体等方面，形成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形态和特质。文学史界对其评价甚高，以为“是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近代散文变革的最高成就”<sup>①</sup>。“变革”正是“报章体”文学史价值生成的根本之所在，革旧开新，启动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报章体”语言的平易，形式的脱羁，内质的现代，“正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sup>②</sup>。

但对“报章体”这样重要的历史存在，学界对其的认知还不是完全清晰，还没有准确地给出“报章体”具体的文体质性，完整地梳理出它的历史流程。主要表现为，一是忽视了“报章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将这一新文体归为梁启超一人之所创，或者只论及梁启超的写作，看不到梁启超之前“报章体”的发生和其后这一文体的变化。两种权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有这样的情况。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言：“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sup>③</sup>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更直接指说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散文”。<sup>④</sup>二是由于对“报章体”历史定位的偏颇，对相关的称名概念在表达上显得模糊。如方汉奇就说，“在近三十年的改良派的报刊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其中著名的有王韬、郑观应、

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唐才常、谭嗣同等。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sup>⑤</sup>。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新文体”、“报章文体”、“时务文体”或“新民体”等是可以置换指称的。但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指称都具有独特的内涵。“新文体”意指其在形态和内存方面的取新特征，“报章文体”突出的是它的载体和传播方式，“时务文体”和“新民体”，既可实指梁启超所主笔的“时务报”体和“新民丛报”体，也可统说此类文体的题材和题旨特点。因此，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说，这些概念并不可以随意置换使用。由此可见，进一步认知“报章体”的文体质性，梳理“报章体”完整的历史流程，是有意义的。

## 一 “报章体”：报刊与论说

学界之所以将新文体视为梁启超一己之功，这或与梁启超的一段著名论说有关联。梁启超曾自言：“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这段文字出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这一著作写成于1920年，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的相关研究多有引用。陈子

展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初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有“古文的演变与新文体的发生”专门章节论述新文体,并认为梁启超“他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体’的开山祖师。他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sup>⑥</sup>。梁启超关于新文体的自得之说,大体给出了这一文体的特点,他的写作可以说代表了新文体写作的最高水平,可以认为表示着新文体散文的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体只是梁启超的一人之事。

回到梁启超新文体写作的高峰时期,我们可以寻见他对新文体是如何指说的。1901年年底,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sup>⑦</sup>这里他强调了指报章对于文体解放、文体变革的意义,间接地言及了报章之体的话题。同时,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例说自己写作的价值:“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sup>⑧</sup>他特别指出《少年中国说》等论说文章对于“开新体”、“激民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其实在晚清直接专门作文以体论文的不是梁启超,而是谭嗣同。我们现在所说的“报章体”,就源于谭嗣同的《报章文体说》(又名《报章总宇宙之文说》<sup>⑨</sup>)。有学者认为,谭嗣同这篇“关于报章文体和文风的论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梁启超。它成了狂飙突进的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时务报章文体’的理论基石。”<sup>⑩</sup>将《报章文体说》视为时务报章文体的“理论基石”,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这篇文论所含的理论要素并不为多。文章很大部分的篇幅用以述说“天下文章的体例”:“今为疏别天下文章体例,去其词赋诸不切民用者,区分为十,括以三类。曰:‘名类’,曰:‘形类’,曰:‘法类’。”“名类得四体”,“一曰纪”、“二曰志”、“三曰论说”、“四曰子注”;“形类得三体”,“五曰图”、“六曰表”、“七曰谱”;“法类得三体”,“八曰叙例”、“九曰章程”、“十曰计”。在此基础上,谭嗣同说明报章“总宇宙之文”的题旨:“乃若一编之中,可以具此三类十体,而犁然各当、无患陵躐者,抑又穷天地而无有也。有之,厥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荟萃,断可识已。胪列古今中外之言

与事,则纪体也;缕悉其名与器,则志体也;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由此可见,《报章文体说》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对这一文体的正式命名,在于对这一文体包容诸体的“汇总”性的指认。报章作为一个硕大的平台,可以承载三类、十体各种文字。很显然,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为“泛报章”体,而不是指因报章而生的独具报章特质的狭义的报章文体。

在我们的论域中,“报章体”特指由报章而伴生的文体。这一类写作所赖以存在的载体是报刊,而且是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近现代报刊,其基本的功能是传播新闻信息和思想信息。“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sup>⑪</sup>与此相应,生成消息报道、通讯、报告文学和时评等新闻文体。在这些文体中“报告新闻,揭载评论”的报道和评论,又是报章最为重要的文体,它们直接定位了报刊的特性和价值。再从梁启超等人“报章体”的写作实际看,所谓开新体的也正是《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这一类文章。其影响很大的就是刊发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论议文字:“《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sup>⑫</sup>因此,从实际的历史存在看,“报章体”所指应是时评论说。这一文体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报章,二是论说,前者是后者发生的载体,又规定了它的特性。在“报章体”之前,论说之文古已有之。先秦诸子言说和辩士游说之辞等,可谓论说文体的渊源。但“报章体”论说文明显不同于古代的一般论说文,古代论说多谈要言妙道,而少直接指说现实的时论。

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先是外报大量开办,后续国人自办报刊兴起。较之以前的“邸报”,近代报刊作为社会传播的方式,是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诚如李欧梵所说:“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

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sup>⑩</sup>这样，需要发出“社会声音”的主体与能够传输“社会声音”的载体之间就达成供需互动的连接。其时报刊是一种市场行为，读者的需求，刺激着报刊版面的设置和文类的安排。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生态，为“报章体”的生成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空间。重视言论类文字，成为其时报刊的共识与公选。《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有新闻消息，也有论说言论。《申报》在创办之初，就在《申报馆条例》中明确征稿取向，“如有名言说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20世纪初年发行的《时报》特别重视时评，在《发刊例》中对“论说”体多有强调，“第一本报论说，以公为主”；“第二本报论说，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第三本报论说，以周为主”；“第四本报论说，以适为主”，“适于中国今日社会”。《时报》时评，虽不及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论说影响广泛，但也成为当时牵动舆论，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的一种体类。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中，就曾回忆到它的特点和影响力：“《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时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sup>⑪</sup>这里，胡适用“公用文体”称名时评，时评实际就是“报章体”，说明这一文体的流行一时。

时评之类是一种时代文体，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也是体现报刊基本特点，实现其价值的重要置备。因此报刊的主办者或主笔对言论一栏特别重视。戈公振考察报刊史，发现“当时主笔之职责，以报首论说为重要。每星期中，某人轮某日，预为认定。题则各人自拟，大概采取本报所载时事，或论、或说、或议、或书后”<sup>⑫</sup>。《循环日报》的王韬就亲力亲为，“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大多出于王韬的手笔。梁启超更是这样，在其主笔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

发表大量的论说文章。这样的作为，既体现了主编主笔职责之所在，也可获得相应的稿酬激励。“报刊社论也是较早获得稿酬的报刊文体。晚清像《申报》、《清议报》等许多报刊的论说一般是由报馆主笔或同人包办，报馆按月支付薪水。”<sup>⑬</sup>当然，“报章体”根本的推力来自读者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梁启超退出编撰，读者担心的是论说从此会有所逊色，因此建议征招外稿以期弥补。《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就记载读者黄庆澄的书札：“尊报改为《昌言报》甚善，惟此后论说宜悉招外稿。果能得朴实痛切之作，且可按篇酬润，则所费者少，所得者多矣。”<sup>⑭</sup>可见读者对于报刊论说的关注。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也为了营造重视言论的某种氛围，《时务报》等还开展专题性的论说征文。如《时务报》在1897年1月13日出版的第17册上，进行以“论中国不能变法之由”等为题的征文，在同年9月7日第38册《时务报》上公布获奖结果。同期又出征文两题：“问泰西日报维新以前一切弊政与中国今日多相类者，能条举之否？”和“《中东战纪本末》读后”。“报章体”在晚清特有的时代语境中，演化成为一种强势的文体，甚至影响到科举考试。据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载：“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sup>⑮</sup>尽管后来戊戌变法未能即时成功，但“报章体”的影响已是不可阻遏。这倒不是说“报章体”本身有多么强大的社会推动力量，而是说它反映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价值。

## 二 “报章体”：从发生到兴盛

无疑，“报章体”是一种历史生成物。“历史”在这里意指“报章体”生成的历史条件，它印证了文随世移、因时而化的文体史基本规律；同时也表示“报章体”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梁启超使“报章体”走向了成熟，以其名字命名“报章体”（“时务文体”、“新民体”），只能表示他对这一文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是这一文体写

作的主要代表性作家,而不能忽视梁启超之前和之后的关联性写作。正如方汉奇所说:“‘时务文体’在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中诞生,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纸文风也有很大影响。”<sup>①</sup>这是所说的“时务文体”,更确切地说是“报章文体”。方汉奇将其置于从1870年代至192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史程中考察,清晰地给出了关于“报章体”发展的历史脉络。这反映了治史者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所说是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的。如果以报刊作为这一史程中的里程碑,那么,可以说王韬的《循环日报》是“报章体”的起点,梁启超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是其成熟的标志,陈独秀的《新青年》、周氏兄弟的《语丝》,是由晚清“报章体”转型为现代杂文的主要站点。“报章体”为论说体,其价值要素是识见、思想,因此从直接的思想关联看,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是“报章体”作家的启发者。龚自珍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放思维和冯桂芬从中外大势的了解中对王朝变革的设计,这些为“报章体”作家提供了思想方法、精神品格。他们的思想元素在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多有可见。

“报章体”的载体自然为报刊,因此从直接的文体联系看,王韬在《循环日报》所刊论说、《申报》等报刊的论说,都是“报章体”发生期的重要存在。《申报》重视言论,这从其初创时大量刊发这一类类可以看出。据徐载平、徐瑞芳统计,“《申报》自公元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起,一个月中共登论说文二十四篇。基本上每天一篇,也有一天登两篇的”<sup>②</sup>。稍后于《申报》创办的《循环日报》开设述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将论说置于突出的位置,使这一日报显示出鲜明的政论色彩。王韬十年间在《循环日报》发表近千篇政论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章政论家。与王韬同时的政论家郑观应,有《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述,三部著作是依次逐步发展完善而成的。而郑观应的论说文字其写作传播的基本载体也是报刊,《盛世危言》即是晚清“报章体”的一种存在。

“报章体”作为一种“体”,其体征特性的形

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现在学界所论,大体是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新文体”的自述而来。胡适认为:“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sup>③</sup>胡适具体分析梁启超散文“魔力”的何由,指出“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二、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感情’”<sup>④</sup>。这里分析几种原因,其实给出的是成熟期“报章体”的基本特征。陈子展则从“求实用,去空谈”、“文体的解放”、“文字逐渐通俗化”、“文法的讲求”等四个方面,分别解析了“报章体”内容、形式、语言、文法的特点。<sup>⑤</sup>

归结这些有关“报章体”特点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生成与报章这一特殊载体紧密相关。尽管在“报章体”的发生时期,这些特点表现出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近似的。“报章体”具有某种新闻的属性,因此它需要更多地介入时务,以现实话题作为论说的题目。《申报》刊行第一个月,发表的论说中有《议建铁路引》、《炮局议》、《医论》、《开矿论》、《论西人电讯、保险、拍卖行等业务》等。郑观应则以《通使》、《自强论》、《日报》、《条约》、《商务》、《银行》等为题论说。选题大多关乎洋务、实业等,在内容上与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桐城派”散文大不相同。“报章体”初起时,西学东渐,欧西文思渐入这一文体的写作。虽然王韬、郑观应的写作,不像梁启超那样更为“革命”,字里行间满是新名词,有规模地传输西学思想,但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于西学的选择和表达。郑观应有《西学》篇,重在介绍阐释声光化电物器方面的“西学”。他还写有《议院上》、《议院下》,解说评论欧美的政治制度。王韬虽然没有直接以西学为题论议,但在《变法》、《重民》、《洋务》等篇中,对西学的内容多有涉及。在《变法自强下》中,王韬以日本之例说明

取西学变法图强的意义：“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这些早期的“报章体”，在表达形式和语言运用方面，远没有后来梁启超的写作体现出显见的“文体的解放”和语言的“平易畅达”，而依然有着传统古文的痕迹，有些文章在结构上注意起承转合，在语言上雅驯文言的比重较大。但是，新的书写内容和用以传播的新的写作方式，必然会改变原有的写作模式。像王韬奉持“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sup>⑧</sup>的为文观念。这样“报章体”在古文的氛围中蜕变已成一种趋势。正是王韬等“报章体”新的文体因素的潜滋暗长，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这些“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解放文体”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新青年》时代建构“随感录”类现代杂文的直接发轫。

### 三 “报章体”：从晚清到“五四”

学界研究“报章体”，通常或以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代的写作为主，或至此为止而不见来者。前者失之于以偏概全，后者隐去历史的流脉，使人不得观照完整的“报章体”。事实上梁启超时期的“报章体”是这一文体发展中的一个高点，但它并没有戛然而止，而对后续的“五四”时期的“随感录”体产生直接的影响。有学者就认为：“梁启超《自由书》中的‘随感录’，直接开启了五四时期‘随感录’创作道路。”<sup>⑨</sup>其实不只是《自由书》，还有《新民说》等，都与“新青年体”、“语丝体”等有关。“五四”“随感录”体也是“报章体”，是“报章体”的现代杂文转型。

我们可从三个方面论说它们之间的关联。一是两个时期报刊理路的连接。“中国知识者大量介入新兴的报刊事业，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⑩</sup>《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等，基本上都是同人刊物，参与其事的编者、作者，以“清议”的方式进行

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刊物成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声的“公共空间”，在特定的时代对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是梁启超的写作成为《新青年》作家群写作取向的示范和重要精神资源。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的言谈和对写作的价值追求中，就可看出晚清“报章体”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周作人日记》一九〇二年七月初三日有记：“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sup>⑪</sup>这里可见，周作人对于梁启超写作的情感取向。周作人虽然后来退为“隐士”，大量写作冲淡闲适的随笔小品，但其前期作为封建文化的“叛徒”，所写杂文有感而发，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力量。周作人这些写作的路径与晚清“报章体”是相近的。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也是“随感录”的重要倡导者和写作者。他对杂感和长篇论说写作的热衷，关乎他对写作价值的选择。在《独秀文存·自序》有这样的表述：“我这几十篇，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版的价值。”<sup>⑫</sup>将陈独秀的这段表述和梁启超相关所说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两人对于写作价值的求取是一样的。梁启超早在1897年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就曾说：“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词达而已，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sup>⑬</sup>在“觉世”与“传世”之间，陈独秀和梁启超一样，选择了“以觉天下为己任”、“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的写作价值。陈独秀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刊发

的大量随感和论说,也许并不能在文学史上流传致远,但对于新文化的建设却有特别的意义。

三是从文体本身看,从王韬、郑观应到梁启超,再到《新青年》作家的写作,50年因时流变,但有基本的逻辑线索贯穿其中。他们的写作都以具有社会传播功能的报刊为载体,由此也规定了作为体类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内容主题表达上他们的写作在取材上重视时务关注,写作的主题设置紧扣时代的重大主题。“变法”、“洋务”是王韬、郑观应政论中的主题词,“维新”、“新民”是梁启超文章中所热衷鼓吹的思想,而《新青年》作家则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致力于“立人”的思想文化建设。与题材主题相应,写作的结构渐趋开放。新的内容、新的思想需要有新的表达方式。王韬的写作强调“自抒胸臆”,到梁启超的时候,“文界革命”旗帜张起,散文的新变已蔚然成风。像梁启超写作《自由书》,“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惟意所之”<sup>⑧</sup>。不同于王韬“自抒胸臆”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写作理念和理想,梁启超的“惟意所之”,这时已是写作的一种现实,他的文章体现出更多的随意缘情由性而为的自由形态,《自由书》的命名也可见其写作的心态。但梁启超的表达工具还是文言,只不过是一种通俗平易的文言,因此还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写作。而到《新青年》作家这里,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对于个性的追求不只是一种“人学”之需,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写作活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的杂感,风格意味各有不同。“报章体”散文,载体的社会传播功能,需要语言面向更多的受众;文本主题的启蒙功能,也需要语言易于接受。这样,必然导致它与传统古文语言景观的不同。“报章体”初期,散文的文言传统秩序没有根本动摇,但这一体式的出现开始启动文言的通俗化。到梁启超这时尽管散文的整个语言系统还是文言的,但“新民体”的语言已是文言与白话结合的“过渡语言”。到了“五四”时期则实现了语言的白话化。由上分析可见,“报章体”发生演进的前后关联十分清晰。其中置前的端点,为后续的发展创设了基础。从总体看,无论是王韬、郑观应的政论,还是梁启超的《自由书》、《新民说》,都还是“宣传”的,是一种直接的论说体。

自然,细分来看,梁启超的文字“笔锋常带感情”,而且像《少年中国说》等篇章也不乏文采。事实上,这也为“五四”时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作了过渡性的铺垫。不同于晚清“政治的”“报章体”,“五四”具有标志性的“报章体”是“文学的”,这时的论说体转型为兼容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亦庄亦谐,自成一统。讽刺深刻,又多幽默智趣,调动种种杂文修辞,服务于思想的言说。可以说,这代表了“报章体”的最高成就,表示“报章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四 主体身份·欧西因素·工具之便

李欧梵在谈到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话题时,对晚清报刊生成的意义颇多关注,并且由报刊推及活动在这一新的特殊领域中的人。公共领域“其所借助的印刷媒体,如报章杂志,在晚清种类繁多,这又不禁使我们关注为这些报章杂志写稿的人”<sup>⑨</sup>。的确,报刊传媒与“报章体”作家的互动,无论是在新闻史上,还是在散文的流变史程中,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存在。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发生积极的互动,其前提就在于具有现代传播功能的报刊与“报章体”作家实现了某种“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的同构相谐。“报章体”为报刊社会传播功能的最大化与散文作家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而有效的方式。“现代传播媒体为知识分子批评时政的议论性文章提供了适当的空间,从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到《新青年》的‘随感录’,以政论为主的报刊文体正是适应了现代知识分子争取公共空间的话语要求。”<sup>⑩</sup>“报章体”作家其价值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注重演绎个人情志的文人,而是襟怀天下以社会进步为其职志的知识分子。报刊成为他们向社会发声的便捷的平台,报刊论说既是媒体自身吸引读者的要素,又是具有知识分子职志的,为报章杂志写稿的人的首选文体。这就是报章之物与“报章体”之人联结的重要逻辑。

从写作主体的角度观察“报章体”,我们可以发现写作者具有基本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这就是说,选择“报章体”的写作,大体上也就选择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这里有一

个主体自觉的问题。中国漫长而严格的封建统治，无法从整体上生成主体公共性、思想性、批判性等机能，但晚清之际这种局面被种种的因素改变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主体角色的自觉。“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任的自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sup>⑧</sup>晚清“报章体”作家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念等，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相去甚远，但大致上集合了知识分子这些身份自觉的条件，他们胸怀民族，放眼世界，忧患时局，关注时务，为救亡图强而激扬文字。王韬的“愁忧”（《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有“独居深念，惄然忧之”语）、严复的“救亡”（《救亡决论》）、郑观应的“危言”、梁启超的“新民”等，都特征性地反映了他们特有的心态和言说的品格。《新青年》作家更是如此，他们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写作对于他而言实际是一种社会行为。蔡元培在《独秀文存·序》中，非常到位地指出了他作为《新青年》作家的价值：“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sup>⑨</sup>鲁迅与陈独秀不同，他更主要的是一位文学家。写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的鲁迅，显示着卓越的创作才华，依理更应潜心于传世的小说创作。“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sup>⑩</sup>但鲁迅以为，“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击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sup>⑪</sup>。这里鲁迅明确了他对于写作

价值的选择。选择“报章体”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们对于身份的自觉，决定了他们社会担当的自觉，这样时代的主题也就成了他们写作的主题。

“报章体”是一种新的文体，言其新，不只是它依凭的载体是新式的，更重要的是它所传输的其中包含了许多新的思想因素。这些新的思想因素，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库中并不存在，而是“报章体”作家从现代西方思想资源中汲取而得的。这就需要写作主体具有开放的思想品格，善于从域外借取思想的工具，用以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论说。观察“报章体”作家的个人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有游历、留学海外的经验。这种特殊而重要的经历，使他们不仅能从一些经典的文本中，获得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认知，而且也能从亲历中获得相应的体验，从而加深对于西方文明生成逻辑的理解与把握，并且将此内化为一种学以致用思想资源。王韬因理雅各“招往泰西佐译经籍，遂得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还数万里”，后又“作东瀛之游”，“居江户者十旬，遍交其贤士大夫”。<sup>⑫</sup>王韬的这种经历和经验，使得他能超越前人，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观察和思考。这样才使他以《弢园文录外编》的卓识异见，成为近代第一位报章政论家。梁启超无疑是20世纪初年中国最具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启蒙的旨归在于“新民”，而何以“新民”，梁启超的回答是“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而从他的《新民说》所论如《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义务思想》等看，许多属于“采补所无”的论说。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梁启超特别强调：“采补所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sup>⑬</sup>“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科学”、“民主”而为其“新”。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在1901年至1914年间四次留学日本，系统地研习西方现代政治学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论说文字，以进化论、民主主义等理论学说论事析理。鲁迅作为现代杰出的启蒙主义文学家，



他的文学的主要价值在于改造国民性。不同于梁启超基于国家意识、国民素养的“新民”，鲁迅以“个人的自大”的“立人”思想为启蒙旨归，为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sup>⑨</sup>鲁迅的这种“个人的自大”思想，很明显取之于西方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在研究“报章体”作家主体特征时，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他们得有媒体的工具之便。观察晚清“五四”骨干“报章体”作家的身份情况，可以发现他们大多具有媒体经验。王韬《循环日报》、严复《国闻报》、谭嗣同《湘报》、陈独秀《安徽俗话报》《新青年》、周作人、鲁迅《语丝》，梁启超更是一代报人。有了这种工具之便，写作在他们这里既是一种工作，又是他们表达自身职志的一种事业。“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做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士大夫得以发挥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sup>⑩</sup>梁启超他们自然无法意识到报刊等对于建设“知识人社会”的意义，但他们已经认知它对于开发民智、改革社会的巨大作用。王韬借论欧西报纸主笔的影响，说明报纸对于人心的牵引：“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sup>⑪</sup>郑观应和严复则从求通去塞、变法图强的角度论说办报大要：“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各县俱设报馆。”<sup>⑫</sup>“《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

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如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sup>⑬</sup>而谭嗣同将报纸视为“民之史”、“国之口”，言之至极：“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闇闇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sup>⑭</sup>到了“五四”时期办报办刊已是寻常事，主事者一般不再高调极言。像《语丝》，“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sup>⑮</sup>。这里的“自由”恰好说出了作者所得的报刊之便。

以上我们对“报章体”这一散文体式的质性和它的历史流变，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梳理。由此可见，“报章体”是一种历史生成物，这一文体因为梁启超等人的亲炙而大放异彩，但并不只是晚清一时所成。从王韬《循环日报》至梁启超《清议报》到陈独秀《新青年》，“报章体”历经了从发生到大盛而转型的历史过程。报刊与论说是生成“报章体”文体特性的基本要素。“报章体”作者的身份自觉和媒体之便，文本中欧西因素的导入等，使其别开新境，意含卓异，成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转型中‘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研究”(11BZW097)、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晚清‘五四’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09YJA751006)阶段性成果]

①②③冯光廉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第40页，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⑤⑥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07页，第205页，第209—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⑦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3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⑧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48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4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⑪《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⑫《时务报》，第29、30册，1897年6月10日、21日。

⑬胡大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81—8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 ⑫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0—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⑬⑭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第129页，第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⑮《胡适全集》第2卷，第40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3—94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 ⑰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第60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 ⑱《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17页—2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⑲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6月。
- ⑳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㉑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 ㉒②②《胡适全集》第2卷，第286页，第28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㉓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第3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㉔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收入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第188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 ㉕《周作人日记（上）》，第344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 ㉖③④《独秀文存·自序》，上海亚东书局1922年版。
- ㉗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7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 ㉘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叙言》，《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
- ㉙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第1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 ㉚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㉛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关于知识阶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㉜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㉝《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第384页，第38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㉞《释新民之义》，《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 ㉟《鲁迅全集·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㊱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收入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第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㊲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3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㊳郑观应：《日报上》，《盛世危言》，第1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㊴严复：《〈国闻报〉缘起》，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5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 ㊵《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㊶《〈语丝〉发刊词》，《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作者单位：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秀臣